

贵州 当代 文学 概观



贵州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 元 华
封面设计 吕凤梧

贵州当代文学概观

王鸿儒 黄邦君 黄万机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八角岩省府大院内)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9印张 240千字
1989年8月 第1版 1989年8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册

ISBN7-5412-0079-4/I.27

定 价：3.50 元

王鸿儒，贵州福泉人。1943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1980年结业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文艺学专业。现为该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著有《蹇先艾评传》(二人合著)、《贵州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四人合著)，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创作并发表过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及电视剧本。

黄邦君，四川大足人，1945年出生。196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0年结业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文艺学专业。现为该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诗人协会理事。著有诗集《抒情短诗一百首》、《生命之张力》、《十八岁的风》；出版诗论集《诗艺探索》、《中国新诗大辞典》(二人合著)、《当代青年获奖诗歌审美谈》(三人合著)以及发表论文数十篇。编选、评点当代青年诗选、当代中学生诗选多种。

黄万机，贵州遵义人，1935年出生。196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1980年结业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文艺学专业。现为该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沙滩文化志》、《郑珍评传》、《黎庶昌评传》及论文四十多篇。

序

蹇先艾

建国40年，个人在这些年里做过的事，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如果从全国或者从一个省区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来看，就使我们深深感到变化之大。特别是在我们贵州，解放后的文学创作日趋繁荣，新人辈出，比之旧时代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在旧贵州，由于地方军阀和反动统治阶级的长期残酷剥削、压榨，加上地理位置的僻远、闭塞，不仅人民贫穷，文化也十分落后。虽然有少数作家，但都在省外从事文学活动，真正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的本土作家和诗人，则寥寥无几。1949年底贵州获得解放，才开始逐渐改变了这种落后的状况。

回顾贵州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个人认为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49年至1966年。这个时期，随军南下而进入贵州的作家，抗战时期回到贵州的进步作家以及各民族中新涌现的文学工作者团结在一起，才算有了自己的作家队伍，成立了组织。作家们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参加土改，深入生活，思想、感情、立场、观点都发生了巨变，在创作上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也有过挫折和失误。第二个时期，包括“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这一时期由于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建立了十多年的文艺团体遭到严重破坏，贵州文坛与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第三个时期开始于1976年，到这本书完成初稿的1986年止，新时期十年的贵州文学，不仅涌现了若干优

秀的中青年作家，而且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写出了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作品。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及影视文学等门类，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贵州当代文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不仅表现出自身的某些特点，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首先，贵州当代文学是多民族的文学。我省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各少数民族解放前基本上没有作家文学。新中国的成立，为少数民族同胞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培养了他们自己的诗人和作家，同汉族作家一道，共同推动了贵州当代文学的发展。

其次，贵州当代文学发展的事实表明，文学的发展同经济的发展不一定成正比。贵州至今在经济上虽然仍处在落后的地位，但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就已经产生了一些有成就的作家。新时期十年的贵州文学的实绩，比起某些经济发达的省份来说，也未见得逊色。这种情况的改变，再次表明了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文学艺术事业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论断十分正确。认识了这一点，就有助于我们理解贵州当代文学的现状，增强信心，将贵州当代文学推进到更新的阶段。

第三，贵州当代文学产生于特定的山区文化背景之下，所以在内容及其形式方面，往往呈现出贵州山区文化的特点。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散文、戏剧，描写的对象大都是山区农村、乡镇的题材。如果说五十年代的作家注目于山区巨大的历史变化，因而热情地高唱颂歌的话，那么，新时期的作家们则是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进一步认识了山区文化的本质特点。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尽管作品的深度不一样，确都共同表现出贵州高原纯朴、清丽的某些风格特点，在主导方面，有着现实主义一以贯之的创作手法。

应当说，这同中外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有关，其中特别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深刻地影响了贵州当代文学的发展。贵州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也促

进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贵州当代文学同样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同建设事业，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贵州高原来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和影响。因为它的光明前景的展望，使得这片土地上的文学多有热烈而诚挚的颂歌；又因为它的特别是在民族地区历史阶段性的巨大跨越，也同时带来较多的难以避免的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片面性。这样，作为文学描写对象的社会主义现实，在贵州作家作品中，表现得更为集中，也较为充分。而极左思潮对文学的冲击，其破坏性也表现得更为强烈。作家们不仅积极投身于现实的社会变革，并且对新的生活热烈向往，这种欣欣向荣的创作气象以五十年代初期最为突出。“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更达到了十分活跃的境界，一些敢于针砭时弊、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应运而生。文学，开始在对旧事物、旧思想的批判中开拓前进的道路；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文学中这一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趋向，遭到了波折。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削弱了，随之而来的便是粉饰现实，1958、1959年间，在报刊上充斥了不少浮泛之作。文艺领域中“左”的倾向已经成为文学发展的桎梏。六十年代初期，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广州会议”，文艺政策得到了局部调整，消息传来，贵州当代文学又重新出现了较为活跃的局面。但是跟着就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将文学引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到了十年浩劫时期，“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高峰，除了少数瞒和骗的“作品”贵州文坛只留下了一片空白。

无论在文学同现实、文学同人民，以及文学同政治的关系上，贵州当代文学的发展及其所遭受的挫折，同样表明了正确处理上述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保证。文学作品只有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当然也要发展），真实地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才有可能做到内容深刻，表达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心声。文学只有密

切同人民的关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才有可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读者。过去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之所以不恰切，是因为长期以来违背文学自身的规律，仅仅把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其结果必然导致文学成为政治观点的演绎和政策的图解，因而失掉了艺术生命力，阻遏了文学事业的发展，甚至对作品进行政治判决，造成难以补救的恶劣后果。

新时期十年的贵州文学，在极大程度上克服了过去错误倾向。由于正确处理了上述关系，作家的创作同人民的关系，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起来。作家不再单向地观照现实，因而不少作品都能比较成功地塑造出各种人物形象，而在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中作家寄予了极大的热情，作品选材和思想开掘，都较前有所进展，文学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向，不仅能够给人以审美享受，也同时发挥了认识社会和健全人格，在潜移默化中给人以教育和启迪的功能。一批中青年作家的涌现，使得新时期十年的贵州文坛变得有声有色，带来了特别引人瞩目的可喜局面。

在纵向的比较上，贵州当代文学的发展固然是可喜的。从横向的比较上看来，我们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例如题材还比较单一，表现手法不够多样，作品的时代感不强，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毕竟不太多，有一些作家的生活积累并不丰富，艺术修养还不够扎实等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努力，以期求得较快的改善。目前各文学品类也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情况。相比之下，小说创作的势头较好。诗歌作品虽多，但有个性有质量的诗作还不多。散文创作尚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报告文学在质量上还需要提高。戏剧、影视文学仍然缺少有份量的作品。总之贵州当代文学与人民群众和党对文学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

提高并发展文学事业的途径之一就是认真地作好尽可能符合实际的总结。正是出于这种良好的动机和愿望，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鸿儒、黄邦君、黄万机三同志，在长期追踪研

究的基础上，又集中两年的时间，广为采集资料，研读大量作品，耗费心血，撰写了《贵州当代文学概观》。这是第一本关于贵州当代文学较为系统全面的概评性专著。这本书的出版，为贵州四十年当代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具有明显的评论者个性色彩的总结。这种对省区性当代文学的概评性研究，在国内尚属首次。正因为是开创性工作，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但是这本著作的问世，既可为贵州文坛，为作家、诗人今后的创作提供某些参照，理论界、评论界的同行们，或许也将由此引起兴趣，把较多的注意力放到对贵州当代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论上来。因此这几位中年理论工作者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应当受到赞扬和肯定。我相信，只要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推动我省的文艺改革，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在不长的时期内，一定会创造出贵州当代文学更加繁荣，更加兴旺的新局面，为“兴黔富民”，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作出文学界应有的贡献。

目 录

序.....	蹇先艾 (1)
--------	---------

第一编 小说创作(上)

一 概 述.....	(1)
二 石 果: 黔北乡土的时代辙印.....	(5)
三 傅 泽: 战士作家的高尚情怀.....	(10)
四 韦 翰: 向往那高翔的云雀.....	(14)
五 伍 略: 为了人类美好的明天.....	(18)
六 苏晓星: 谱写心中的光明赞歌.....	(24)
七 滕树嵩: 民族气质的深入发掘.....	(26)
八 胡学文: 苗家生活激起的共鸣.....	(30)
九 涂尘野: 让创作更接近于生活.....	(33)
十 谭良洲: 民族生活的诗意追寻.....	(38)
十一 刘荣敏: 侗乡风情的真切描绘.....	(40)

第二编 小说创作(下)

一 何士光: 新旧交替时期的人生图画.....	(45)
二 叶 辛: 同代青年的代言人.....	(49)
三 李宽定: 女性形象的精心塑造.....	(53)
四 顾汶光: 驱策历史的艺术实践.....	(57)
五 王 剑: 当代生活的热情观照.....	(60)
六 石 定: 抒写挚爱乡土的心绪.....	(65)
七 雨 煤: 呼唤人道的艺术探索.....	(68)
八 余未人: 在文学的“冬泳”中拼搏.....	(71)
九 陈学书: 雅俗共赏的刻意追求.....	(74)
十 其它中年作者的创作.....	(77)

十一 其它青年作者的创作·····	(83)
-------------------	--------

第三编 诗歌创作 (上)

一 概述·····	(93)
二 钟 华: 贵州高原的最初歌唱·····	(97)
三 张 克: 淳朴深厚的乡土诗情·····	(102)
四 寒 星: 历史断层的深刻反思·····	(106)
五 廖公弦: 清新淡雅的田园牧歌·····	(111)
六 潘俊龄: 苗族风情的绚丽画卷·····	(115)
七 黄邦君: 追求诗的力度与内涵·····	(119)
八 周嘉堤: 黑色星星闪射的光辉·····	(123)
九 李发模: 心灵深处的时代呼声·····	(127)

第四编 诗歌创作 (下)

一 贵阳地区的诗歌创作 (一) ·····	(133)
二 贵阳地区的诗歌创作 (二) ·····	(140)
三 黔北地区的诗歌创作·····	(150)
四 黔南、黔东南的诗歌创作·····	(157)
五 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	(165)
六 散文诗及其他形式的诗歌创作·····	(171)
七 贵州高原上的新生代·····	(177)

第五编 散文与报告文学

一 概述·····	(187)
二 蹇先艾: 新生活的赞歌·····	(190)
三 《挡不住的洪流》: 砸碎枷锁的实录·····	(193)
四 风物山水散文: 山乡奇观·····	(198)
五 戴明贤: 山谷幽兰·····	(208)
六 李起超: 春江涨潮·····	(213)
七 报告文学: 时代奋进曲·····	(218)

第六编 戏剧与影视文学

一 概述·····	(229)
二 话剧：时代风云的录像·····	(233)
三 黔剧：山乡梨园新绽的奇葩·····	(244)
四 花灯剧：散发泥土芳香的山花·····	(250)
五 京、川、评、越、豫剧作：群芳吐艳·····	(255)
六 歌剧、民族戏：多彩的民族风情·····	(262)
七 儿童剧：金色韶光的礼赞·····	(265)
八 影视剧作：高原影坛添异彩·····	(267)
后 记·····	(276)

一、概 述

小说创作，在贵州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贵州出过诗人、散文家、剧作家，唯独没有小说家。“五四”以后，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蹇先艾以“乡土文学”名世的创作，方才填补了这一空白。这位作家顺应民主、科学的进步潮流，以他的小说作品一面揭露旧社会的腐败和黑暗，一面以无限的深情，述说着贵州山民的不幸和悲苦，以其现实主义精神和成熟的艺术技巧，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给贵州当代文学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建国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之后，贵州小说作家、作品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有的成为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有的作品还译介到海外。整个小说创作队伍构成了贵州当代文学中一支特别引人注目的劲旅。

早在五十年代初期，贵州全境获得解放，结束了剥削阶级统治这片高原的历史，党和政府便领导着贵州各族人民走上了当家作主的康庄大道。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需要选择容量较大的艺术形式。于是小说创作便开始勃兴起来。老作家蹇先艾于散文创作之外，继续用小说赞颂新人新事；从老解放区来的作家邢立斌，也发表了他的《在客车里》、《冰雹》及《小山的故事》等新作。而石果、傅泽、胡学文、苏晓星、涂尘野等文坛新人相继涌现，他们的小说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贵州山区引起的深刻变化，不仅表现出贵州山民力图挣脱封建传统、封建意识束缚的斗争历程，而且热情地颂扬了各

族人民建设新贵州的壮举，作品中充溢着作家对新生活的热烈向往之情。在反映所有制关系改变所引起的思想、行为冲突上，一些作品还能达到相当的深度。石果的名篇《风波》、《喜期》、《官福店》便是此间有全国影响的上乘之作。当然，这一时期贵州的不少小说还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情节简单，描写粗疏，艺术质量一般不高。

党的“双百”方针提出之后，贵州小说创作扩大了取材的范围，开始从较单一的农村题材中解脱出来，创作质量也有所提高。傅泽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小姐妹们》，微山反映肃反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这也是战争》，苏晓星描写人性的中篇小说《良心的中伤》等，都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一些作品开始干预生活，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生活中新的问题和矛盾，艺术上虽不成熟，但都能大胆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干部的蜕化变质等等。揭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这本来是作家出于革命责任感所进行的创作探索，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地批判了这些作品，并且殃及作者，扼杀了刚刚萌生的文艺幼芽。贵州小说创作同全国小说界一样，旋即转入低潮。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反右倾”，使得大量粉饰现实，图解政策的平庸、虚夸之作充斥报刊；而“左”的文艺思潮再次冲击着作家的现实主义。当时即使是成熟的作家石果等人的小说也都受到政策和时风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打上了浮夸，虚饰的烙印。贵州小说在艰难中迟缓地迈步。六十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文艺政策开始宽松，文艺界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口号，贵州小说创作方才恢复了生机，出现了韦翰、伍略、滕树嵩、刘荣敏、谭良洲等一批新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创作起步不久，便引起了读者的关注。随着技巧的提高，韦翰的《山里的声音》，伍略的《泉水之歌》，滕树嵩的《侗家人》，刘荣敏的《忙大嫂盘龙灯》等作品，都在当时

赢得了读者的欢迎。可惜好景不长，1962年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将小说创作引入了配合阶级斗争的狭路，同时对其他题材的作品实行了讨伐。“四清”运动中，全璜（汪小川）反映四方面军长征生活的中篇小说《冲出绝境》受到内部批判，周青明写贸易经纪人的《大树脚》则在报刊上被公开点名批评，滕树嵩写人性之美的《侗家人》则引起争议，一些文章指斥其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一时间黑云压城，人人自危，有的作家噤若寒蝉，有的虽仍在创作，但作品中多半带上了“左”的印记。不久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老作家蹇先艾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艺黑线在贵州的代理人”，青年作家们多被批斗、专政。贵州小说创作队伍被彻底摧垮，百花凋零，万马齐喑，很长时期内只留下了一片空白。

1976年十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清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到了贵州高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小说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很快进入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初步繁荣时期。

新时期贵州小说创作，首先冲破了“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禁锢，摆脱了长期以来极左文艺思潮对创作的束缚，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恢复。同人民一道经历了十年浩劫的贵州作家们，在《班主任》、《伤痕》等作品的带动下，义不容辞地以其痛切、感人的笔触，开始书写十年灾难在高原人民心灵上留下的创伤。张永龙的《黑豆队长》，黄尔康的《摔碎的小提琴》，汤宝华的《宿命》等是较早出现的“伤痕文学”作品；雨煤取材于农村的小说，也持续性地揭露了苦难岁月中发生在贵州乡间的种种人生悲剧；韦翰、伍略、余未人、苏晓星、罗国凡等作家则从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民族同胞等各个侧面控诉了林彪、“四人帮”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且开始了历史的反思。一方面则尽力开掘了苦难中人们相濡以沫、相互帮助的善美人性，同时更

表现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堂堂正气及其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青年作家叶辛和王剑写知青题材的中、长篇小说以其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十年动乱在这一生活领域制造的不幸，表现了知识青年的坎坷遭遇及其觉醒，其中特别是叶辛的小说，很快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反响，使他得以成为贵州小说界最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之一。

正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在贵州文坛方兴未艾之际，贵州农村掀起了以推行生产责任制为发端的伟大历史变革。生产力的解放引起的农村生活的激变，最早地进入了作家何士光的创作视野，他以深厚的理论功底、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体验和洞察生活的敏锐眼光，创作了《乡场上》等“梨花屯”系列小说，深刻地反映了新时期贵州农村的巨大变化，两度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为贵州小说创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他如罗国凡的《“节日”回到布依寨》，谭良洲的《娘伴》等则从民族的角度展现了农村新时期崭新的生活内容。

改革浪潮在全国城乡掀起之后，新的生活必然激起作家们新的创作热情，并且引入作品。如王剑反映工矿、部队亟须实行改革的中篇小说，正表明作家密切关注着处于深刻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现实。其中特别是《纵深地带》为作家带来了声誉。另一位以写中篇见长的青年作家李宽定，他的《女儿家》系列中篇小说则以其对黔北风土人情的深情描绘，对贵州乡镇妇女形象的动人刻画，展示出贵州乡镇历史的和现实的画卷，别具一格。另一位黔北作家石定，则用清新的笔触描绘黔北农村变革时期的生活，写出农民新的期冀与渴望，使他的短篇小说《公路从门前过》在全国获奖。而顾汶光、戴明贤的历史小说则无疑增添了贵州小说创作的品类。填补了历史小说的空白。其中特别是顾汶光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渡魂》，以其刚柔相济的笔致，描绘了太平天国将士艰苦卓绝的斗争，成功地塑造了石达开这一悲壮的英雄形象，作

家本人则因此被国内评论界誉为“历史文学创作中一位有成绩的后起之秀”。雨煤的《啊，人……》，伍略的《麻栗沟》、苏晓星的《人，始终是可爱的》等作品，则从人性的角度大胆地进行了探索，成绩虽大小不等，但都共同突破了小说创作界长期被视为畏途的领域，带有启蒙主义的色彩。而雨煤的长篇《雾山》则是对于人道主义的呼唤。韦翰的《山外青山》更将人性之美溶入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之中，从而拓展了人的主题的境界。新时期贵州小说在反思的基础上也体现了较强的批判精神，何士光的《青砖的楼房》、陈茂荣的《迫在眉睫》、司马赤的讽刺小说、和国正的《降压灵》等作品均把批判锋芒指向极左的谬误及党内、军内的不正之风。一些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有的则开始表现人的原始生命力。一批起点甚高、富有探索精神的后起之秀已经出现，壮大了贵州小说创作队伍的阵容。

纵观贵州新时期十年的小说创作，无论作家队伍的建设还是作品的数量、质量，均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佳状态。这首先表现在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恢复和发扬，一些新的创作手法开始引进，小说的品类逐步增多，题材的范围大大扩展，作家的小说观念正在逐步更新……随着文学界“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贯彻执行，贵州小说创作一定会取得更为可观的成绩。

二、石果：黔北乡土的时代辙印

石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早年，当过红军，打过游击，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开始小说创作，作品后来结集为

《喜风集》，于1982年出版。五十年代英文版《中国文学》译载过他的《风波》和《喜期》，日本、丹麦曾译介过他的小说，日本《读卖新闻》还评介过他的作品。石果是五十年代贵州文坛成绩最大的一位作家。

石果解放前长期生活于黔北农村，学生时代即在党和红军的影响下踏上革命道路，故能自觉运用阶级观点分析贵州农村生活，这是作家得天独厚之处。新中国成立之后，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以及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建设，在他心灵深处有着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体验和理解。曾经一度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胜利，在作家踏上创作之路后，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便成为一种自觉的颂歌。在《石土地》、《喜期》、《官福店》等篇章里，他写清匪反霸运动怎样砸烂了套在农民身上的枷锁；写土地改革怎样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写互助合作中农民怎样组织起来向自然作斗争……作家满怀喜悦的心情，赞颂新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巨大变化，《送秧》、《小钟儿和他的羊》、《挑战》、《帮助》等，都热情地赞扬了在农民群众以及新一代中日益成长着的优良品质和继承下来的传统美德。作家着眼于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翻身，由此去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新社会的伟大历史变革怎样给农民带来美满幸福的新生活。作家在唱颂歌的时候，往往联系着旧社会反动统治者在人间制造的苦难，《喜期》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叶三娘家破人亡的惨剧。土地改革之后，当女儿叶玉珍的婚期将临时，离散多年的儿子也归来团聚了。这一小户农家的悲欢离合，形成的强烈的新旧对比，使作品的主题得到了深刻的揭示。那一张“换子之约”演成的故事，不只暴露了地主阶级的残忍，同时也反映了劳动者的善良。在热情的颂歌中，作家以较高的概括力和细致的描写，赋予作品以深刻的人性内容，并以此打动读者，这是《喜期》从思想到艺术都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